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0/5
30 January 1990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

智利的人权问题

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多·博略·希门尼斯先生(哥斯达黎加)

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89/62号决议授与的任务提出的智利

人权问题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一、 导言	1 - 8	2
二、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9 - 10	4
三、 对进一步侵犯人权行为的申诉	11 - 12	5
四、 结论	13 - 31	24
五、 建议	32 - 43	28

一、导言

1. 自1974年以来，人权委员会和大会一直在审查智利的人权情况。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也审查这一项目。

2. 根据1979年3月6日第11(XXXV)号决议，人权委员会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责成其调查智利的人权情况。此后，委员会在1980年2月29日第21(XXXVI)号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将智利失踪者问题列入其报告。

3. 有关这一问题的特别报告员依次是阿卜杜拉耶·迪埃耶法官(塞内加尔)、拉杰苏默·拉拉法官(毛里求斯)，目前是1985年2月1日就任的费尔南多·博略·希门尼斯教授(哥斯达黎加)。

4.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备有现任特别报告员关于智利人权情况的第八次报告(E/CN.4/1989/7)。委员会在审议报告后通过了1989年3月8日第1989/62号决议。委员会在该决议第9段中：

“决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再延长一年，并请他就智利的人权情况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和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决议中还：

“决定在第四十六届会议上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审议智利的人权情况，并根据此一情况的发展确定如何在议程上处理该项目。”

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接着在其1989年5月24日第1989/147号决定中通过了委员会第1989/62号决议。

6. 据此，特别报告员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交了其第九次报告(A/44/635)。这是关于1989年全年中智利人权情况演变的初步报告。大会赞赏地注意到这份报告，并于12月15日通过了第44/166号决议。该决议第13段全文如下：

“请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参照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报告评价智利的人权情况，审议特别报告员的职权以及如何根据情况的发展在议程上处理这一项目，并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7. 依照上述决议，特别报告员谨在此提交其1989年第二份报告，作为其关于智利人权情况的第十次报告，供委员会审议。本报告述及1989年下半年最重大的发展动态，因此应连同经增订的提交大会的报告(A/44/635)一起阅读。

8. 这一次，特别报告员没有从智利政府收到任何资料。他只能通过智利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非正式地获取一些有关特定问题的资料。特别报告员还从他提供与其职权有关的证词和文件的其它有关各方得到了资料。参照智利批准的国际条约中确定的准则和被确认为普遍适用的其它国际人权法的准则，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分析。

二、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9. 特别报告员在其向大会提交的前一份报告中提到他就该国在他履行人权委员会赋予他的职责方面予以合作一事同智利政府的通信往来 (A/44/635, 第13—15段)。尤其是1989年9月11日, 特别报告员通知智利外交部长说, 他希望恢复几年来他们之间已习以为常的工作关系, 并表示深信该国政府会设法恢复在其履行职责方面给予合作。特别报告员还希望该国政府依照他以前四次正式访问所确立的程序就他的职责准他再次访问智利 (第15段)。

10. 外交部长在1989年11月2日的信中作出了答复, 重申其政府的决定, 即由于人权委员会对智利持有的态度系出于政治和思想意识的, 故不接受延长特别报告员的任期, 但智利部长还重申, 智利将继续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参加联合国的普遍和经常的活动, 并将继续逐步采取旨在增强对人权保护的国内措施。除了别的意见以外, 他还说, 其政府决定不同意进一步的特别程序是以国家利益为理由, 即国家和实质性考虑重于其他考虑, 对智利的歧视态度是不能接受的, 这种态度不宜继续予以合法化。最后他指出, 其政府的决定不是出于与特别报告员个人有关的任何原因。

三、关于进一步侵犯人权的申诉

11. 本节包括的资料编自特别报告员从有关各方及其律师和智利人权组织收到的法律文件，关系到据称在1989年6月至12月期间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和以前的案件一样，编入这些申诉不应被视为特别报告员对案件的是非曲直构成预断。

12. 和以前一样，特别报告员愿给该国政府一个表示意见的机会，为此，于1990年1月11日会见了智利驻哥斯达黎加大使。在会见时，他向大使递交了给智利外交部长的一封信，其中附有前一段中提到的申诉的备忘录。他对申诉中所述情况表示关注。同一天晚些时候，智利大使使用电话通知特别报告员，他不能正式转交该信和备忘录。第二天，在1990年1月12日的一封信中他肯定说不能接受这一请求，因此将备忘录退还。

A. 生命权

A. 1. Luis Virgilio Abarca Año. 1989年8月18日向圣地亚哥第二十一刑事法庭提出一份申诉。根据申诉，1989年8月13日，受害人和 Elías Pizarro 被三名刑侦警官截住，并立即被搜身和戴上手铐，然后用警车带到 Calle Zapadores 警所。根据申诉，受害人遭到射击，然后被带到 José Joaquín Aguirre 医院。

他的母亲也获悉他的情况处于危险状态。与受害人谈过话的 Mónica Año 被告知说，是侦探向他开的枪。受害人由于伤势过重于8月21日死亡。看到射击的证人 Elías Pizarro 被传唤到圣地亚哥军事法庭后已获释。

A. 2. Jécar Antonio Neghme Cristi. 受害人的母亲和妻子于1989年9月8日向圣地亚哥第四刑事法庭提交了一份关于杀人罪的申诉。申诉中说1989年9月4日一些陌生人向受害者开枪，受害者身中12弹，当即死亡。那一天，Jécar Neghme 参加了一个积极从事维护和促进人权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维护人

民权利委员会在其总部举行的会议。根据申诉，作为证人的该委员会干事注意到那一天他们的建筑物受到一些便衣人员（短发，状似运动员，身着黑色短皮上衣）的严密监视。负责监视者属于一个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搜查和跟踪行动的组织。受害人是革命左派运动的发言人，以此身份作为左派联合政治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会议。根据申诉，由于 Jécor Neghme 是左翼政治组织的一位领导人，因此经常成为一些人进行公开迫害和威胁的目标，所使用手段和现有安全机构通常的手段是一致的。根据申诉，被人们认为是极右派的两个武装集团——第一个自称为“9月11日阵线”，第二个称为“黑衫司令”——在合作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介上公开宣称它们对有关行动负责，这就证明了谋杀 Jécar Neghme Cristi 的政治动机。

B. 身心健全的权利

B. 1. Victor Alfonso Díaz Gonzalez. 早在1989年9月27日就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第89-089号案件）。据请诉书中说，1989年9月24日，一些身穿制服的警察来到请诉人的家。他们要请诉人随他们到警所。他一到那里，就遭到殴打并被带上手铐。然后他被转移到 Peña Lolén 警所，在那里他受到更严重的殴打，治安警察对他全身拳打脚踢，他们把一个袋子放在他的头上使他喘不过气来。由于受到这种虐待，请诉人患了癫痫病。1989年9月25日，请诉人在承诺在以后几天向警所报告之后被释放。据请诉书中说，请诉人被指控参加了对一名警察的未婚妻的袭击。

B. 2. Juan Carlos Ramírez Peña. 1989年10月6日向上诉法院提出了请诉书（第940-89号案件）。据请诉书中说，1989年10月5日，请诉人和另外几个青年一起正在和平庆祝1988年公民投票胜利一周年时受到警察的干预。因为参加庆祝的青年受到一群反示威者挑衅和攻击，发生了一场街头殴斗。据请诉书说，警察只逮捕和带走了反对军政府的青年，而不管挑起殴斗支持军

政府及其候选人Hernán Büchi 的年轻人。据请诉书说，请诉人受到重伤，面容被毁。1989年10月9日法医报告的结论是，Juan Remírez的伤“显然是钝器所致，不是重伤，会愈合，但必须在10—12天内预防并发症，7—8天内不能活动”。

B. 3. Julio César Sazo Castillo 于1989年10月27日向第五军事法庭提出起诉，控告特别部队的宪兵官员使用不必要的暴力的罪行，他们于1989年10月12日在圣地亚哥的Esteciór 的中心地区执勤。根据原告，1989年10月12日，Sazo Castillo 观看工人自立联合会主持的公共集会，他在那里一直呆到民主集会总统候选人 Patricio Aylwin Azócar 发表讲演才离开。当他决定回家时，他遭到特别部队宪兵的毒打和逮捕。Sazo Castillo 的头部遭到棍打，头颅被打破，他还遭到拳打脚踢。根据原告，Sazo Castillo 起初被带到宪兵局，由圣地亚哥第四地方警察法院的法官处置。

B. 4. Maximo Illanes Pacheco 1989年10月30日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庭对三名侦缉人员提出起诉。根据原告，1989年5月10日Illanes Pacheco 在他工作的地方被侦缉人员逮捕。在逮捕后他被带到 Calle Borgono 侦缉局。根据原告，约在夜里11点左右，三名侦探开始审问原告，他的腹部和脊柱连续遭到约20分钟的毒打。原告遭到同样官员的第二次毒打，鼻梁骨被打断。大约在凌晨3时30分左右，他第三次遭到殴打，主要是腹部和脊柱部位。由于忍不住疼痛，原告被迫承认了某些罪行。Illanes Pacheco 被转移到侦缉总局，后来被送到监狱，交给第九刑事法庭处置。

B. 5. René Eduardo Penno Osorio 1989年11月14日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庭提出起诉。根据原告，受害者于1989年5月11日大约深夜12点被逮捕，被带到侦缉局，在那里他一直被拘留到5月13日。拘留期间，原告遭

到拳打脚踢，他的头、身体主要部位和四肢遭到钝器的毒打，并在将遭到更厉害酷刑的威胁下被迫签署一份供述。根据原告，Penno Osorio 被转送到监狱，交给第九刑事法庭处置。

B. 6. David Manuel Sagues Espinoza 早在1989年10月22日曾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第1165-89号案件）。根据请诉书，请诉人几次遭到劫持（1989年10月17、26和31日；11月6、14和22日）并遭到劫持者的捆绑、毒打和威胁。请诉书中说，他被审问他同MAPU党、Lautaro 运动、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Florida MAPU的领导人和为 Vicaria de la Solidaridad工作的律师和医生的关系。

B. 7. Oswaldo Emilio Arce Carrasco 和 Oswaldo Maximiliano Arce Maldonado 1989年11月28日向圣地亚哥第一军事检查办事处提出起诉。起诉中说，11月25日下午3时许，一组宪兵官员向原告挑衅，原告遭到毒打。根据原告 Oswaldo Arce Carrasco 和他的4岁的儿子，Oswaldo Arce Maldonado 被宪兵在地下拖了约一个街段的距离，然后被释放最后他们两人、特别是他的儿子脸上和胸部都留下了很深的伤痕。

B. 8. Carlos Benavides Carvacho, Manuel Jerez Rubio 和 Luis Scott Reyes 1989年12月20日向圣地亚哥第三军事检查办事处提出起诉。根据原告，他们于12月10日遭到军队机动车辆维修站的士兵使用不必要的暴力而受伤。Carlos Benavides在维修站内遭到若干士兵（包括 Nco Romero）和穿便衣的人的毒打。他不得不到矫形手术医院治疗。Manuel Jerez 几次被大粒散弹打伤，伤势很重，不得不到中央医疗所治疗。Luis Scott Reyes 遭到袭击并遭到棍棒的殴打。

C. 自由权

C. 1. Juan Andrés Ordenes Narváez 1989年5月4日向圣地亚哥军事上诉法庭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根据请诉书，他自1989

年5月11日以来一直被拘留在库里科近郊的 Itahue 镇，并被移交该市军事检查官处置。自从被捕后，他经常被单独监禁。请诉书中说，长期单独监禁 Ordenez Narváez 是对他权利的严重侵犯，因为他被剥夺进行公平审判和指定一名律师的权利。此外，由于据称他在逮捕时遭到虐待，他的身体状况不良。由于他一直被单独监禁，情况更加恶化。

C. 2. Marco Antonio Quintanilla Pizarro 和其他7名学生。根据1989年8月7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提出的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他们于1989年8月7日被警察逮捕，当时他们正举行和平示威，对给学生的经济援助的数目表示不满，因为这些援助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请诉书中说，这八名学生没有任何武器，在进行和平示威时被警察制止。他们被逮捕，并被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根据请愿，他们可能被带到第一警所。

C. 3. Mariá Teresa Quijada Donoso 和 Miriam Ivonne Rojas Rubio
1989年8月21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请诉书中说，受害者被一大队穿便衣的人逮捕，后者没有表明他们的身份也没有出示主管当局签署的逮捕或搜查证。根据请诉书，这些人逮捕了两名妇女，由于遭到毒打和大量出血，她们的状况十分危险。请诉书中说，这两名妇女可能被拘留在侦缉总局。

C. 4. Jessica Antoia Liberona Niñolas 和 Claudia Andrea Liderona Niñolas
1989年8月21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请诉书中说，他们被一支穿便衣人数众多其中有些人配带武器并戴有滑雪面具的队伍逮捕。根据这一请诉书，上述这些人并未表明他们的身份，也没有展示任何授权批准逮捕受害者或对他们的住家进行搜索的法庭命令。

C. 5. María Raquel Echiburu Alfaro 1989年8月21日向圣地亚哥的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请诉书中说，受害者是被

显然属于侦缉局的防止暴力罪行队人员逮捕的。根据这一请诉书，受害者的父亲被告知，其女儿被关押在侦缉总局。但是侦缉总局拒绝向他提供任何关于其女儿被捕的情况。请诉书中说，她已怀孕四个月，正在接受十分复杂的治疗。

C. 6. Aída Elizonda Ahumada 1989年8月21日向圣地亚哥的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请诉书中说，她被一支着便装多人组成的队伍逮捕。这些人戴有统一的帽子和臂章并携带轻机枪。根据请诉书，这些着便装的人员试图搜寻一名叫 Victor Noguera 租用这所房子的人。Elizondo Ahumada 夫人遭到逮捕并被押往一个不为人知的地点。请诉书中说，人们认为她被押往侦缉局的中心营，仍然被关押在那儿。

C. 7. Julio Enrique Gerding Salas 1989年8月29日向圣地亚哥的上诉法院提出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根据请诉书，他于1989年8月28日在圣安东尼奥省 Llolleo 市其住所被捕。逮捕他的人并没有展示任何法令或搜查证，因为有关其专业活动的文件已经被扣押。请诉书中说，他被押往侦缉局的中心营。他仍然被关押在那儿。他的被捕可能与其妻子的兄弟 Sergio Buschmann Silva 遭到审理有关。其兄弟正在受到有关“纵火案”的调查。

C. 8. Ana Lorena Díaz Ramírez 1989年8月30日向圣地亚哥的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请诉书中说，她与其他三名年轻人在出席有关失踪的被拘留者问题会议时遭到逮捕（1989年8月30日是国际失踪的被拘留者日）。根据请诉书，受害者是被警察逮捕的并被押往 Macul 警所。她仍被关押在那儿。

C. 9. Miguel Angel Cabrera Hernández 1989年9月1日向圣地亚哥的军事上诉法庭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根据请诉书，他在 Puerto Montt 空军基地服役。1989年8月29日有人向其家人打匿名电话报告说他已经被捕并由飞机押往圣地亚哥。根据请诉书，当其家人试图从空军基地了

解情况时，他家人被告知他正在参与军事行动。9月6日，其姐妹向军事上诉法庭提出了请诉书，在请诉书中她说，1989年9月4日智利空军发布了新闻，承认他已被捕，因为他被指控与可能参与 Tobalaba 空军基地事件的某一团体有关，上述事件造成了武装冲突中两人死亡。

c. 10. Roberto Segundo González Lagos 和其他37位学生。1989年9月3日向圣地亚哥的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第842-89号案件)。根据请诉书，他们是 Blas Cañas 各学院的学生。在 Blas Cañas 学院内举行了与政治领袖 Jécar Neghme 之死有关的仪式，并随后上街游行，提请公众关注这一令人憎恶的罪行。请诉书中说，警察来到后立即向校园内投掷催泪弹、霰弹，打破校门并进行搜索。根据请诉书，接着警察逮捕了上述申诉人。

c. 11. Esteban Romo ,Ana María Domínguez and Antoio Román 1989年9月8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第850-89号案件)，其中阐明他们于1989年9月9日被捕。当时他们正在参与在法庭前举行的有关人权和 Jécar Neghme 遭到谋杀的一次集会。这次集会是由各社会和政治组织召集的，以便向公众报告并请求公众舆论注意国内的严重情况。根据请诉书，他们遭到非法和任意逮捕，并仍在关押中。

c. 12. Miguel González 和其他四名工会领袖。1989年9月15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第869-89号案件)。请诉书中说，他们于1989年9月15日被警察逮捕。Miguel González 是工人自立联合会的全国顾问，并且是全国工业工会联合会的领袖。当天，他会晤了其他工会领袖并与他们一同前往法院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封信。阐明全国工业工会联合会谴责对分别担任工人自立联合会主席，Manuel Bustos Huerta 和副主席 Arturo Martínez Molina 的逮捕。他们遭到警察用水枪和催泪弹发射枪的攻击。根据请诉书，他们随后被逮捕。

C.13 María Estela Ortíz, Parada 的遗孀。1989年10月4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第921-89号案件)。请诉书中称,她在1989年10月4日下午2时左右被警察特种部队成员逮捕,当时她正在圣地亚哥 Libertador B. O' Higgins 大街和 Bulnes大街街角参加一次纪念 Jécar Neghme 先生的集会。据该请诉书说,她被用一辆大型警车带往圣地亚哥中心的警所。

C.14 Carolina Arrau Bruna, Victoria Oyarzun 和 Silvia Espinoza。根据1989年10月5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的关于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第931-89号案件),他们在1989年10月5日下午2时45分左右被警察逮捕,当时他们正在参加一次自发的和平集会,庆祝1988年10月公民投票中“否决”成功一周年。请诉书称,他们在圣地亚哥 Plaza de Armas 附近被捕并被带往一个警所,至今还被关押在那里。

C.15 Verónica Herreros Infante。1989年10月5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实施宪法权利请诉书(第938-89号案件)。请诉书称,她在1989年10月5日下午被警察逮捕,当时她正在参加圣地亚哥人民自发举行的和平示威,纪念1988年10月公民投票“否决”的成功。她被任意非法拘留。

C.16 Mauricio Alejandro Villarroel Sepúlveda 和 Marcelo Andrés Villarroel Sepúlveda。据1989年10月7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的关于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称,他们在1989年10月17日上午4时30分左右被一大群穿制服的人员逮捕,这些人员自称属于警察特别行动小组。他们的家也遭到警察的搜查,然后他们被带往第三警所。请诉书称,一名警官说 Marcelo Andrés Villarroel Sepúlveda 属于“Lautaro 青年运动。”

C.17 Nelson González Urzúa 及其家人。1989年10月19日向圣地亚哥第十四刑事法庭对两名侦探提起申诉,其中一人是 Héctor Guzmán Runco 据申诉称,1989年10月7日, Norma Runco Chamorro 和 Héctor Guzmán Runco 来到 González Urzúa 家收取原告母亲欠他们的一笔债务。因为 González Urzúa 没有偿付这

笔债务，来访者威胁要再来收帐。据申诉人称，Guzmán Runco 和另一人后来带着武器来到他家。他家遭到搜查，他们并威胁要强奸他的妻子、绑架他的儿子。据申诉人称，他的父亲和姐妹来到他家，他们也遭到胁迫，特别是他父亲被推进一辆汽车挨了打，并被威胁要对他施以电击和类似的酷刑。

C.18 Rigoberto Omar Hernández Ruiz. 根据1989年11月6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的关于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他在1989年11月6日被治安侦辑局的两名侦探在家中逮捕。他在被捕时脸上被一名侦探所带武器打伤。

C.19 Manuel Alejandro Martínez Sandoval 和 Miguel Antonio Martínez Sandoval. 1989年11月11日向 Aguirre Cerda 总统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第309-89号案件）。根据请诉书，1989年11月10日上午6时左右，一大群显然属于治安侦辑局的便衣人员来到请诉人家中将其逮捕。被捕后，他们被带往一个地点不明的地方，至今仍被关押在那里。

D. 安全权利

D.1 Manuel Vergara Meza 和 Luisa Toledo Sepúlveda. 1989年4月28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要求保护的请诉书。根据请诉书，圣地亚哥棚户区（Pudahuel, Villa Francia 等等）的一些年青人被一名叫、或化名叫Manolo的人为政治目的而招募。请诉书中说，据称那人试图在对他们进行彻底训练并束之以严格的纪律之后将他们用于诸如“在地铁和拥挤的电影院等处安置炸弹、杀害社会主义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便夺取政权”的活动。申诉人称，用这一姓名并与之相貌相符的人于1989年1月初来到他们家中，举止象个治安人员，他公开泰然地对他们进行人身威胁，甚至威胁这些年青人和儿童的生命安全。

D.2 Ricardo Cubillos Contreras. 根据1989年6月23日向圣米格尔上诉法院提出的要求保护的请诉书，他在1989年6月18日回家途中遭到四名便衣武装人员的拦截。请诉书中称，他们用粗暴无礼的语言对他进行骚扰，并指责他据称与一个极端分子小组有关。他们还盘问他与获释政治犯Waldo Ogaz Peña之间的友谊关系。最后，他们威胁说，若他继续进行其通常的活动就将他处死。他担心自己的安全。

D.3 Juan Carlos Urrea Méndez。和其他24人。1989年6月22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据请诉书称，1989年6月22日上午11时左右，数百名智利邮政工人聚集在邮电总局(Plaza de Armas)内，抗议削减预算、取消邮包服务和试图使邮政私营化。请诉书中称，示威是和平的，但当工人们进入工作场地时，他们却遭到警察特种部队的暴力攻击。虽然示威者没有任何挑衅行为，但请诉人却遭到毒打。约50名工人被非法逮捕，这违反了《宪法》的最基本规定。

D.4 Inés del Carmen Yáñez Olguín。1989年6月23日向圣米格尔上诉法院提出了请诉书。请诉书中称，约60名穿制服的人员对她家进行了彻底搜查。她和孩子们受到跟踪，他们担心其生命安全。据请诉书称，她的儿子Jorge Claudio Navarrete Yáñez 涉入一起令人迷惑的事件，据一份官方调查说，她为他购买用作出租的小汽车实际上被用来运送武器。她认为这一事件与她和她的家人遭到公然骚扰和威胁之间有关系。

D.5 Jorge Javier Parraguez Moreno。根据1989年7月24日向圣米格尔上诉法院提出的要求尽早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1989年7月23日《民族报》报道说，请诉人被指称参与了1989年7月17日在拉平塔那市的“接管”，并在该次行动中“扔了两颗没有爆炸的手榴弹。”请诉书中声称，这种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他从未到达过他认为扔过手榴弹的地方，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工作。他为自己的安全和人身自由感到担忧。

D.6 Humberto Alex Contreras Silva。1989年8月3日，向圣米格尔上

诉法院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其中声称，他从1989年7月23日《时代评论者报》得知，市区警察总署的第250号报告指控他是据称参与过接管萨尔瓦多达利棚户区的武装团伙的首领。据该请诉书称，他当时在出事地点是因为他正在找一份建筑工作。

D.7 Loreto Cristina Valenzuela Valdivia, Francisco Huneeus Cox 和 Sebastián。1989年8月11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一份要求保护的请诉书。据请诉书称，在那天，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非法闯入请诉人住宅，扔了一颗燃烧弹，造成物质损失。该请诉书声称，这一事件是由于 Cristina Valenzuela 在一部关于流放和参与1988年10月5日在公民投票时投“否决”票政治宣传的电影中公开担任角色。她在请诉书中声称，演员们都受到这一类侵害以及对他们生命、家人和财产的威胁，目的是阻止他们表达思想和意愿。

D.8 Pablo Rodríguez Whipple。1989年9月1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第828—89号案件）。据请诉书称，他是1976年7月27日失踪的建筑师 Alejandro Rodríguez 的儿子。一些失踪者的家人时有接触，结果他们受到跟踪和监视。按请诉书中所说，请诉人的汽车曾遭到搜查，他本人受到监视。

D.9 Juan Eduardo Cornejo Ilva。根据一份1989年9月6日向阿吉雷·塞尔多总统上诉法院提出的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第249—89号案件），请申诉人于1989年9月6日上午6时左右遭到侦缉局人员的逮捕，Aldo Ruiz Espinoza 目击了这次逮捕。根据1989年9月7日 Nancy Espinoza Gutiérrez 提出的证件，请诉人被转移到位于 Gran Avenida 的看守所，他在那儿呆到下午两点。他被质问关于参与抢劫和他与 Pablo Cristián Ruiz Espinoza 的关系。据报道，他受到质询和殴打。后来他被释放。

D.10 Jorge Nicanor José del Carmen Osorio Vargas 和其他23人。1989年9月7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一份要求保护的请诉书。所有这些请诉人都在拉丁美洲成人教育中心工作。据请诉书称，他们经常受到可能是被称为“9月11日”集团或运动对其安全和人身完整的威胁。请诉书中称，“9月11日”集团或突击队最近声称对谋杀领导人 Jécar Neghme 负责。

D.11 Luis Maira Aguirre, Denise Pascal Allende, Patricio Rivas, Manuel Riesco Larraín, Humberto Martone 和 Carlos Molina Bustos。根据1989年9月8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的要求保护的请诉书，请诉人是广大社会主义左翼党的干事。由于与广大社会主义左翼党有联系的联合左翼党领袖 Jécar Antonio Neghme Cristi 被谋杀，他们为自己的安全担忧。他们也收到了死亡威胁。根据他们的请诉书，广大社会主义左翼党、基督教左翼党和联合左翼党政治委员会全国总裁 Jaime Cavada Alcaide 受到不明身份的一男一女的踢打，试图谋害其性命。按照请诉书，广大社会主义左翼党总部经常受到不明身份人的监视。

D.12 Julio Raúl Morales Vidal。1989年9月28日向阿吉雷·塞尔达总统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第259-89号案件）。请诉人称，由于（1989年9月26日）他几次被穿便衣不肯说明身份并拿着并非其本人照片的人搜查，因此他对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根据请诉书，他曾住过的房屋也遭到同一批不透露身份的穿便衣的搜查。

D.13 María Nancy del Rosario Blaset Castro 和 Nancy Marlene Parra Blaset。根据1989年9月29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的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第267-89号案件），请诉人的家受到显然是保安或警察人员的监视，他们想了解1986年10月遭到绑架和酷刑后一直住在国外的其家人 Enrique Parra 的活动。

D.14 Fortunato Segundo Zúñiga Espinoza 和昆塔普通出租车司机联合会成员。1989年10月23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一份要求保护的请诉书。请诉人是昆塔普通出租车司机联合会的秘书，他接到若干次恐吓电话。请诉书中称，他接到下列这样的恐吓：“Villanueva 和 Zúñiga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要把他们全杀死”；“不要再让联合会总部支持 Aylwin，别制造混乱使政府丧失信誉”；“Lagos 和 Aylwin 都不能拯救你。”所有这些电话都是匿名的。

D.15 María Estela Ortíz Hojas 和未成年人 Javiera Parada Ortíz, Camilo Parada Ortíz, Juan José Parada Ortíz 和 Pablo Antonio Parada Ortíz。1989年10月27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要求保护的请诉书（第369-89号案件），请诉书中说，请诉人是第21区代表候选人。她担心本人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安全，因为她曾被人监视，并多次被跟踪。请诉书中还说，请诉人的父亲是 Fernando Ortíz Letelier，他从1976年起失踪，她的丈夫 José Manuel Parada Maluenda 在1985年3月29日被谋杀。Ricardo Manzi Jones 给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一份书面陈述中也重申，请诉人和她的子女受到监视和跟踪，他对他们的安全表示担心。

D.16 Nelson Antonio Andrade Alcaíno。1989年11月2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宪法权利保护令的请诉书（第1039-89号案件）。请诉书中说，请诉人于1989年11月2日大约下午12时30分被侦缉局人员逮捕。根据请诉人1989年11月3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书面陈述，他于11月2日被侦缉局人员逮捕，被带到 Calle Borgoño 警所。在被拘留期间，他受到拳打脚踢，并威胁和警告他不要与任何组织接触或向上诉法院提出请诉书。当天下午约2时，请诉人被释放。据他的书面陈述说，侦缉局人员仍扣押着他个人的证件。

D.17 Pablo Jorge Rossel Díaz。1983年11月3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要求保护的请诉书（第452-89号案件）说，请诉人是未成年学生。因他受

到恐吓，因此对他的安全有所担心。根据请诉书中所说，恐吓之一是：“共产党分子，你活不长了”。这句话是用剪报拼成的，后面有一个标记，与极右翼组织Patria y Libertad的标记相同。根据请诉书，1988年10月5日，Pablo Rossel 业已受到过一批无赖的袭击，他当时在庆祝投否决票获取胜利，而那些人在搞反示威。在给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第二份书面陈述中（第452-89号案件），Pablo Jorge Rossel Diaz 说，1989年11月5日他又一次遭到一些乘坐菲亚特147型轿车的人的袭击，他们向他投掷了一枚爆炸装置，他设法躲开。这份书面陈述还说，1989年11月8日下午约4时50分他遭到侦缉局人员的逮捕，这一次对他身上的东西作了登记，又对他的活动进行了审问，他随后被释放。

D.18 Mónica Yolanda González Mujica。 1989年11月8日向圣地亚哥第六刑事法庭提出的一份起诉书，11月7日，原告的汽车遭到被形容为“有意的”炸弹袭击。陈述中说，原告是记者，他在《分析》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关于 Pinochet Hiriart 家族财产增加的文章之后，收到了若干次电话中的死亡恐吓。原告对她本人和她丈夫 Rodrigo González Lopez 的安全表示担心，她丈夫是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的一个律师。

D.19 Jorge Martínez, Claudio Molina Donoso, Heriberto Mena Batres, Pedro Fuentes Trejos 和500名其他政治犯。1989年11月23日给最高法院的一份书面申诉说，签名者是被关在圣地亚哥 Centro de Detención Preventiva Norte（前公共监狱）的全国政治犯协调机构领导人。这份书面申诉说，对政治犯的任意和非法行为司空见惯，同样，监狱里的隔离措施也是一样，这通常是军事检察官下令干的。申诉中接着说，这些措施等于是单独监禁，长达数月，有时数年。这种长期监禁给一些受到影响的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混乱。例如，犯人 Roberto Iko Andaur 已被单独监禁了一年半以上。这一措施是海军检察官 Miguel Angel Muñoz

下令进行的。作为对这种措施的一种反应，瓦尔帕莱索防护关押中心的41名政治犯在1989年10月23日决定，在单独监禁的措施取消之前，不向检察部和刑事法庭作任何供述。申诉中还说，7个女政治犯被关押在圣米格尔男犯监狱，已单独监禁了数星期。迄今她们还没有被转移到圣地亚哥关押女政治犯的圣多明各防护关押中心。她们是：Raquel Echiburú（带孕），Jessica Liberona，Hilda Alvarado，Andrea Oyarzún，Nancy Rivera，Verónica Moreno 和 Jessica Briones。据说这些女犯的生活条件恶劣，对于向她们采取的惩罚措施没有任何保护。

D.20 国家情报署的文件（原称“国家情报局”）。Ramón Briones Espinosa 和 Hernán Bosselin Correa 于1989年12月5日提交共和国审计长的书面陈述阐明，国防部长已作了若干次关于销毁属于被称之为国家情报署（原称国家情报局）的安全机构的文件的声明，国家首脑最近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书面陈述中说，国防部长和国家首脑都说现有的一些文件没有必要继续保存，因为这些文件已失时效，因此已无重要意义，从而可以处理掉；这些文件包括上述国家安全署的档案。书面陈述中说，第18.845号法案是在1989年11月3日《官方日报》上公布和发表的。该法案的第6(3)条规定了关于销毁文件的一般程序。法案的第10条载明，教育部1929年第5.200号法律顺序法令的第14条中所提及的实体，实际上即国防部、武装部队、秩序和安全机构以及其他向国务秘书处负责的机构（例如国家情报署）受权根据第18.484号法案确立的限制和程序进行销毁文件的工作，而且上述法案高于其他任何规定。书面陈述中说，目前在法律上当局有可能命令完全和部分销毁国家情报局即国家情报中心的文件。销毁文件引起一个严重的宪法问题，因为这实际上削减了司法部进行调查并作出裁决的权力。书面陈述中说，这是首次以这一类法律授权销毁官方档案，从而，除其他法律资产之外，损及国家对这些档案的所有权，且无补救的可能。

D.21 Patricia Inés Gutiérrez Cárdenas, Jeanette Marianela Garjardo Fuentes, Jorge Mario Patricio Herrera Vargas 和 Luis Artemio Flores Lazcamo. 1989年12月5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要求保护的请诉书(第513-89号案件),其中述及有关人士积极组建智利大学牙医学院教职员协会。请诉书中说,在1989年11月24日至27日的不同时间在他们各自工作地点,他们分别接到来自自称为“十二月解放突击队”的一个极端主义组织的死亡威胁。这些威胁显然是由同一个人在电话中作出的。Jorge Herrera于11月24日首先接到电话威胁。打电话者说:“12月14日将是你的末日,同时还有 Patricia Gutiérrez, Jeanette Garjardo 和 Luis Flores”。威胁电话中最后说:“十二月解放突击队必胜”。请诉人对他们的安全感到担心。

E. 享有适当审理和程序保障的权利

E.1 Reinalda del Carmen Pereira Plaza, Edras de las Mercedes Pinto Arroyo, Santiago Edmundo Araya Cabrera, Armando Portilla Portilla, Walto Ulises Pizarro Molina, Lincoyán Yalu Barrios Cataldo, Luis Segundo Lazo Santander, Juan Fernando Ortíz Letelier, Horacio Cepeda Marinkovic 和 Lisando Tucapel Cruz Días. 根据第2.77号案件,上述10人是在于1976年11月29日至20日之间被捕和失踪的,并由调查法官 Carlos Cerda Fernández 进行了调查(见E/CN.4/1986/2号文件内背景资料, D.2号案件, A/41/719号文件附件, D.27号案件以及E/CN.4/1987/7号文件, D.29号案件)。还可记得, Cerda 法官于1986年8月14日依据非法合伙的理由将38名士兵和2名平民提审。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根据起诉将提起诉讼的法令搁置在一边,并通知 Cerda 法官说应发布一项法令,根据1987年第2191号赦免法令撤销该案件的起诉。随后 Cerda 根据参与与上述10人失踪有关的非法合伙,将 Manuel Salvatierra, Rojas Jorge Lobos Henríquez, Manuel Muñoz Gamba, 和 Daniel Luis Enrique Guimpert Corvalán 提审。根据起诉,上

诉法院驳回了起诉令并发布了另一项指令撤销对第2-77号案件的起诉(1987年6月1日的判决)。此外,在1989年8月11日的裁决中,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法院针对判决书中的程序性错误和基本性错误要求予以撤销的请求,并对这一判决给予全面肯定。因此,最高法院确认不受理对第2-77号案件的起诉,不对上述10人的失踪进行调查。

E.2 Juan Waldemar Henríquez Araya 和 Wilson Daniel Henríquez Gallegos.

1989年8月17日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书面陈述中说,1987年7月22日和8月6日分别向圣米格尔第六刑事法院提出了关于Juan Henríquez和Wilson Henríquez谋杀案的指控。书面陈述中说,受害者是被国家情报署人员在“阿尔巴尼亚行动”中杀害的(也被称为基督圣体节谋杀案)。请诉书中说,这些行动是在两年前发生的。军法当局处理这一调查已有一年半以上,但是,国家情报局仍未根据法院20多次发出的指令提供资料,尽管所寻求的这些资料对于澄清谋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

E.3 Rodrigo Andrés Rojas de Negri y Carmen Gloria Quintana Arancibia

第二军事法庭1989年8月24日对第1609-86号案件作出了判决。这一判决确认了特设军事检察官1988年12月22日的裁决(见A/44/635,第E.5号案件),该裁决判处Pedro Enrique Fernández Dittus 300天监禁(最低限度),而且在服刑期间不得工作、不得担任公职,因为他于1986年7月2日在圣地亚哥城对上述人士犯有准杀人罪和严重人身伤害。根据该裁决,Rojas de Negri 和 Quintana Arancibia 和其他一些青年共同谋划在Avenida General Velásquez 设置火障,目的是阻挠公路交通。为执行其计划,他们准备了轮胎、燃烧装置和约5公升汽油。这两名青年被Fernández Dittus少校指挥的保安部队逮捕后,靠墙站在离爆炸物品很近的地方(Calle Hernán Yungue的南面街沿)。根据该裁决,Quintana 猛然踢向装有可燃液体的瓶子,火焰立即吞没了这两名青年。根据该裁决,事故发

生一小时后，保安部队才请求医疗援助，让人将这两名青年送往 Irene Frei Polyclinic。1986年7月6日，Rodrigo Rojas de Negri 由于全身65%二度和三度烧伤，死于公共援助中心医务所加护病房。Carmel Gloria Quintana Arancibia 受到严重伤害，烧伤面积达61%。

E.4 Maria Isabel Beltrán Sánchez。军事检察官8月30日介入了军事上诉法庭的第507-89号案件，根据与刑法第93(3)条有关的刑事诉讼法第408(5)条的规定，请求驳回本案和第二军事法庭第1616-84号案件，该案是有关失踪的 Maria Isabel Beltrán Sánchez 的案件中推定的过失。由于这一请求，那些可能被起诉的人得到1987年第2191号法令中颁布的大赦，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罪名、废除所处刑罚和中止其执行程序。

E.5 Fabián Ibarra Córdova 和其他7名失踪的被拘留者。1989年11月22日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一份申诉（上诉法院第465-78号案件和瓦尔帕莱索军事检察署第230-77号案件）称这些人是革命左派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他们在1975年1月17日至27日之间被国家情报局逮捕。所有被拘留者都被国家情报局人员带到比尼亚德尔马的Maipo团，随后又在1月28日和29日间被转移到 Villa Grimaldi —— 国家情报局在圣地亚哥的一个秘密营地。1975年2月20日，8名犯人从 Villa Grimaldi 被带走，去向不明。该申诉是针对圣地亚哥上诉法院1989年11月15日的裁决提出的，援引第2191号法令要求撤销第230-77号案件的诉讼。法院裁定，第2191号法令对1973年9月11日至1978年3月10日之间犯下罪行的罪犯、同谋和从犯给予大赦。法院认为，大赦是有利于社会安宁与共处的一种完全赦免，其作用是取消犯罪行为的处罚后果。因此，大赦不仅取消处罚，也取消罪行，并可在审判的任何阶段或判决以后宣布。

E.6 Jorge Martínez Martínez, Claudio Molina Donoso, Heriberto Mena Batres
和 Pedro Fuenbtes Trejos, 及 500 名其他政治犯, 1989 年 11 月 23 日
向最高法院递交的一份书面材料称, 签名者是圣地亚哥北部预防性拘留中心(原公
共监狱)政治犯全国协调机构的领导人。递交的材料称, 约 500 人目前关押在智利
监狱; 所有人都遭受到一种或多种残忍的酷刑。酷刑的目的很可能是要得到有关受
害者所属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情报。根据这份书面材料, 施行迫供是过去 16 年来所
谓的保安机构经常不断采用的手段。这份书面材料请求最高法院加速审理该材料中
指明的指控保安人员施加酷刑的 19 起未决案件。

E.7 Germán Alfaro Rojas, Hugo Segundo Peña, Gustavo Villalobos Sepúlveda,
Ramiro Francisco Olivares Sanhueza 和 the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军事检察
官 1989 年 11 月 20 日针对第 782-86 号案件中的被告作出了裁决, 该案与攻
击 Lautaro 面包房有关,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对此十分关切。军事检察官在
该裁决中要求将谋杀警察 Miguel Vásquez Tobar 和商人 Simón Yévenes Yévenes
的罪犯 Germán Alfaro Rojas 和 Hugo Segundo Gómez Peña 判处死刑。根据该裁决,
违犯控制火器和爆炸物品法第 8 条所列罪行的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的职员,
Gustavo Adolfo Villalobos Sepúlveda 律师和 Ramiro Francisco Olivares
Sanhueza 医生, 应处以 5 年严格监禁。至于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军事检察官
在裁决中主张: “对组织援助和保护那些参与暴力行为的人的 Vicaría 当局及其职
员, 可部分延缓审判。” 其余被告处以不同程度的监禁, 从严格终身监禁至 541 天
监禁不等。

E.8 Juan Moreno Avila, Víctor Leodoro Díaz Caro, Jorge Mario
Angulo González, Arnaldo Hernán Arenas Bejas, Lenín Fidel Peralta
Véliz, Héctor Figueroa Gómez, Ricardo Alex Contreras González, Maur-
icio Fabio Arenas Bejas, Héctor Washington Maturana Urzúa, Juan
Andrés Ordenes Narváez, Richard Ledesma Plaza, Manuel Araneda Gonzá-
lez, Miguel Colina Valdivia, José Ugarte González 和 Jose Luis Dono-
so Cáceres. 1989 年 11 月 24 日, 军事检察官针对第 1919-86 号案件中的

被告作出了裁决。该案件与1986年9月7日在La Obra 区攻击总统车队有关，也与1988年10月21日攻击Los Queñes 及1989年4月11日在Talca 攻击军人、治安和公安人员有关。军事检察官在裁决中要求对上述15名被告判处死刑，对其他13名被告判处长期徒刑。第二军事法庭1989年11月20日下令：“应将指控提交内政部指定的律师，以便其可在法定期限内或表示赞成，或提出另外的处理办法……。此步骤完成后，即进行安排，使被告得以按指定顺序对指控作出答复，每人有6天期限……”。因此可以推断，每一被告仅有六天时间准备答辩。然而，根据其他资料，辩护律师提出，最高法院在对反恐怖主义法因与宪法不符而不适用这一点作出裁决之前，应中止审判程序。

四、结 论

13. 特别报告员在编写本报告时希望强调，智利目前的人权情况与1985年2月有很大不同。过去五年间，智利人权情况出现了显著改进，越来越尊重各种形式的自由。

14. 1985年2月特别报告员接受任命时，智利社会正处于高度的紧张状况，一个不幸的后果就是发生了严重地、有计划地侵犯基本人权的行。政府产生于1973年的一次政变，是一军事政权，内部行政流放层出不穷，酷刑和非法胁迫盛行，这主要是国家情报机构所进行的广泛镇压的一部分；当时实行了戒严和另外两种紧急状态；政党被禁；政府控制着大学；共和国总统根据宪法拥有过大的权力，这与民主原则相抵触，极易遭到滥用，损害了基本权利，特别是损害司法；反对政府的人经常受到恐吓，并通常遭到严重后果；成千上万的智利人被流放；警察、安全部队和武装部队行为粗暴，超越其职权，侵害了智利人的基本权利；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受到共和国总统的过分权力的严密控制。

15. 尽管处于这种情况（这里仅仅概述造成紧张局势的一些主要因素和这五年期间的分裂状况而已），智利人民仍拿出远见、勇气和智慧，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

各阶层都有个人和团体为此努力，将建立民主政体作为最高目标。

16. 1985年开始逐渐变化。1990年则已截然不同了。由于第14段提及的障碍已经消除，实行代议制民主——自由的监护人——的道路已畅通，因此在两次值得纪念的时刻——主要是1988年10月和1989年12月，智利人民可通过在有利的气氛中进行的选举来行使其决定自己政治前途的权利。

17. 除了1989年12月进行的选举外，下列事态发展也促进了本报告所涉期间人权情况的改善：(a)执政委员会（现立法机构）通过了国民议会法案，规定了下院和上院的组成和权力。两院的议员在上述选举中产生，他们将于1990年3月14日开始履行职责。该法具有宪法地位，是特别报告员在其任期内努力促成的法律中的最后一项法律，它们的宗旨是作为新民主结构的组成部分，保护基本人权；(b)结束了对两名重要工会领导人的国内行政流放；(c)执政委员会通过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各种修正案，以求更好地保护在民事法庭受审判的人的权利；(d)民事法庭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正确步骤，圣地亚哥第三刑事法庭的 Dobra Lusic 法官判处四名国家情报局人员徒刑，他们伙同其他一些有组织的平民（一共40人）袭击了1983年5月1日在圣地亚哥委内瑞拉广场示威的群众。判决书说袭击者的目的是“使用暴力来镇压示威者的精神反抗行为”；(e)1990年1月11日宣布解散国家情报局（秘密警察）。

18. 特别报告员希望提请注意两个业已证实而且特别重要的新的倒退发展：

- (a) 临时军事检察官 Renato Gómez 要求对袭击总统车队和袭击 Los Queñes 的案件中的15名被告判处死刑；军事检察官 Francisco Silva 要求对1986年谋杀宪兵 Miguel Vásquez Tobar 的案件中的另外两名被告判处死刑，在该案件中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的两名职员也受到起诉。
- (b) 最高法院最终决定结束检察官 Carlos Cerda 进行的调查。法院不仅未对 Cerda 法官进行的调查作出任何行动（Cerda 法官对维护人格尊严表

现出了令人钦佩的仔细彻底和献身精神，对此司法部门应积极加以保护），而且法院还阻止他在10名失踪囚犯的案件中取得最终的调查结果，并阻止他对1973年政变后所报道的涉及令人憎恶的拘留后失踪的其他许多未决案件进行类似的调查。

19. 政府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缔结的协定仍在执行中，以防止酷刑行为。该协定是特别报告员倡导拟订的，它是智利人团体反对智利政治体制中盛行的酷刑行为的结果。特别报告员在四次访问智利期间与这些团体保持密切联系，根据它们的经验和委员会的经验，向政府高级官员表明了他对负责审讯被拘留者的官员普遍使用酷刑深为关注。政府官员作出了积极反应，于是签署了目前的协定，协定中包括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主要提案并根据经验对一些内容作了改善。

20. 由于这些事态发展，有系统的酷刑做法已经停止，当然尚未彻底消除，对此特别报告员仍十分关注。

21. 特别报告员继续密切注意军法审判。其做法违反一般司法的普遍原则以及军事政权的具体原则，损害了智利人的人权。因此，特别报告员严厉谴责并继续谴责这种做法。除非对军法审判痛加改革，智利人状况将永远不会稳定，永远受到智利人和国际民主社会的深切关注。

22. 在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前夕，军事检察官要求判处17人死刑，这给智利人权状况罩上了阴影。已得到智利批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美洲人权公约》（智利也批准了该公约）第4条强调“人人有权使其生命得到尊重”。应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审查对上述17人判处死刑的要求。

23. 除了那些被烧死的人的案件（Rodrigo Rojas 和 Carmen Gloria Quintana）外，另外3起臭名昭著的案件的事实调查工作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而在被烧死的人的案件中，虽然对有罪之人作了判决，但就其行为的严重性而言量刑过轻，从而使判决起不了任何儆戒作用。

24. 除了智利政府提出的反驳 (A/44/728) 外, 在本报告所涉期间, 特别报告员没有发现任何新的证据, 因而无法对他在给联大的第九次报告中提到的发生在 "Colonia Dignidad" (大部分居民是德国人) 的侵犯人权的指控形成意见。然而, 特别报告员认为应对该问题进行仔细和全面的调查, 这不至于象智利政府所说的会损害智利主权。

25. 1987年底失踪的5名被拘留者的极其令人不安的案件仍未得到澄清。

26. 在编写本报告时, 特别报告员未得到智利政府的官方合作。他仅能通过智利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非官方地获得有关具体问题的一些资料。

27. 继续恢复人权保护制度的重任将落在1989年12月选举中产生的智利新政府的肩上; 对许多个人在1990年3月(民主政府开始执政)之前遭受的冤屈一定要平反。这一任务显然将成为新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代议制民主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和确保自由受到普遍尊重, 并通过这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途径来为维护人格尊严的任何活动创造条件。特别报告员还认为, 在此情况下, 特别报告员就无须进行任何活动了, 尽管联合国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国际合作具体形式来保护人权。当然, 这应留交智利政府和人权委员会斟酌决定。

28. 尽管如此, 要确保智利社会有一个保护自由的可靠法律制度, 还需做很多事。将于1990年3月实行的代议制民主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起点, 在此基础上继续为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自由进行斗争。但这不是说可以忽略新政权的人员和机构在这个领域将面临的重大障碍, 这是新的政府制度和民主生活本身的性质以及多年来智利社会中的尖锐政治矛盾再加上暴力所造成的深刻裂痕所决定的。

29. 没有必要强调新政府将要面临的在性质上不同于任何教条的种种困难。只需铭记温斯顿·邱吉尔1947年11月11日在下议院中说过的一句名言: “在这个充满罪孽和痛苦的世界里, 人们曾经尝试过而且今后还会尝试许许多多的政府形式。没有人妄称民主是完美无缺的, 或者是全能的。事实上有人说过, 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如果把所有其他政府形式除外的话”。

30. 也不需要强调智利近些年来所经历的严重悲剧的影响。但是，值得回忆一下威廉·莎士比亚在《特洛伊路斯和克莱希达》中的两句话。第一句是：“人自己造成的创伤很难痊愈”（第三幕，3, 229）；第二句是：“结尾会说明一切；时间这个亘古唯一的裁判终会使它结束（第四幕，5, 224）。

31. 另外，智利人民为争取其本来就应当有的基本权利，排除万难，做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因此，毫无疑问，自由和民主事业必将在智利生根。

五、建 议

32. 智利政府应在其法定权限内尽可能施加影响，阻止17名被告的死刑判决付诸执行，这些人被控于1986年9月袭击总统车队、袭击Los Queñes和造成宪警 Miguel Vásquez 死亡，另有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的两名职员也因而受到起诉。

33. 特别报告员曾在以前的报告中指出，有必要寻求一项法律和政治解决办法，使 Carlos Cerda 法官能够竭尽全力调查10起拘留后失踪案件以及1973年后报道的其他类似案件的所有方面。

34. 必须防止酷刑或非法强制行为重演，即便这种行为只是偶尔发生而不是有计划地迫害，也不容许。因此，有必要检视一下智利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间的现行协定，确保这些协定一直得到最有效的执行，保护因任何理由被捕的人，包括单独监禁的人，尤其是由于政治原因被捕的人。必须全力调查有关遭受酷刑和非法强制的申诉，务必依法惩办那些严重侵犯基本权利的人。

35. 必须审查和改革军法审判制度，以防止过分行为。特别报告员在以前的报告中已指出，这种过分行为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许多最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根源。

36. 对负责调查臭名昭著的割喉案，“Corpus Christi”杀人案、阿尔巴尼亚行动案以及1986年9月谋杀案的检察官或特别法官，政府应尽力给予合作。

37. 另外一起著名的烧伤致死案件的诉讼也应结束，以便高等法院（军事上诉法庭和最高法院）有机会公正地审查第二军事法庭1989年8月24日的判决。

38. 智利应迅速批准美洲人权公约（圣何塞公约），并随后承认美洲人权法院的管辖，该法院是公约建立的两个人权保护机构之一。智利还应当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使个人得以向负责维护公约所载权利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陈述或申述。

39. 最近解散的国家情报局的档案应妥为保存，以协助法院对人权案件进行调查。

40. 应立即全力完成对现称为国际移民组织的前政府间移民委员会的人员和建筑受到猛烈袭击一案的调查。袭击发生在1986年。不按照特别报告员的建议采取行动，就是掩盖这一暴行，鼓励其他类似的攻击在智利从事活动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行为。

41. 应当对依照特别报告员在前九份报告中提出的建议采取的行动作出评价，以便采取有关措施促进智利人民的人权得到有效保护。

42. 应全力进行有关 Colonia Dignidad 成员涉嫌犯罪的法律诉讼。智利政府当局应尽可能对负责审理此案的法院给予合作。

43. 特别报告员还要强调，必须改善土著居民、特别是马普切人的状况，以确保其权利得到尊重。

×× ×× ×× ×× ××